

新疆喀什边境管理支队排依克边境派出所
民警虎摄（人民视觉）
新疆喀什边境管理支队排依克边境派出所
民警虎摄（人民视觉）

在瓦罕走廊边境线上看戍边精神传承——

“界碑在哪里，戍边人的心就在哪里”

环球时报记者 林小艺 曹思琦 樊巍

本版背景图由AI生成

因为去世的父亲和一部老电影，北京游客陈大维专程来到了瓦罕走廊。

站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以下简称“塔县”）排依克边境派出所门前，望着远处的雪山，她不禁想起《冰山上的来客》里的经典台词：“向天空放射三颗照明弹，让它们照亮祖国的山河！”这部电影承载着两代人的记忆，而陈大维的声音穿透着海拔3780米雪域的风声。

“这部电影我看了无数遍，小时候父亲陪我看，长大后我陪父亲看……父亲在2023年11月离开后，我总会回忆电影中的情节。我一直在想，如果有一天我能来到帕米尔高原，来看看这里，也算是替他完成一个心愿。”陈大维的声音带着些许颤音。

当排依克边境派出所所长彭明有说起影片中英雄阿米尔的原型的孙子肖恭尼·龙吉克，此刻正作为副所长在派出所值班时，陈大维顿感惊讶，难以置信地看着肖恭尼缓缓向她走来。“能和您合张影吗？”她激动地和肖恭尼握手。父亲时常念叨中国军民的智勇，《冰山上的来客》里边疆战士和杨排长一起与特务假古兰丹姆斗智斗勇的画面，此刻，在陈大维的眼前具象化了。

位于瓦罕走廊中国段“一所临三国”的排依克边境派出所，自1950年成立以来就守护着这条连接中国与阿富汗、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的通道。197.4公里的边境线上，一代代戍边人用生命践行着派出所外墙上的那句醒目的誓言：“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

在这里，英雄的后代有很多，信仰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坚守，而是一代代人的接力。

“没有祖国的界碑，哪有我们的牛羊”

和陈大维一样，肖恭尼小时候也是在父亲的陪伴下观看这部电影的。他至今还记得，那个特别的暑假，常年在外执行任务难得在家的父亲陪他看完这部电影后，告诉他，“电影里的主人公就是根据你爷爷的经历塑造的”。

肖恭尼的爷爷卡德尔·阿布力克木，是《冰山上的来客》中戍边战士阿米尔的原型。这部1963年上映的经典影片，展现了新疆各族军民守卫国境线的动人故事，成为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看完电影后，七八岁的肖恭尼懵懂地意识到：爷爷是个英雄，而英雄要忍受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

“没有祖国的界碑，哪有我们的牛羊。”这是肖恭尼从小听家人经常说的一句话。

肖恭尼的曾祖父阿布力克木是家族第一代护边人。塔县曾是古丝绸之路要隘，新中国成立前，这里常有土匪袭扰，阿布力克木一家人在深山里东躲西藏。中国人民解放军入驻帕米尔高原，改变了阿布力克木家族的遭遇，结束了他们流离的生活。

1996年出生的袁啸是排依克边境派出所唯一的硕士。从甘肃政法大学硕士毕业后，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来到喀什，最终选择驻守在这片海拔3780米的边境线上。

“为了追寻爷爷的足迹。”当被问及为何选择戍边时，袁啸的回答干脆利落。

袁啸的爷爷是原疆字120部队的战士。1974年，他的爷爷主动请战要求到最艰险的地段工作，成为援巴筑路队伍中的一员。“我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小时候常听爷爷讲高原修路的故事，就想长大后一定要来看看他工作过的地方。”袁啸说。

然而，理想与现实总有落差。2023年8月报到当天，高原就给了袁啸一个“下马威”：刺骨寒风让他站都站不稳，严重的高原反应更让他头痛欲裂。望着荒凉的大山，这个初来乍到的新人都一度陷入迷茫：“家人都支持我来戍边，我也自信能独当一面。但第一次到海拔5100米的边境线巡逻时，看着适应自如的同事，我在心里疯狂地自我怀疑：空有理想，我能做什么？”

转折发生在袁啸看到民警刘磊刻下的“别害怕”石头那一刻。“师父告诉我，每个新警都要经历这个阶段。”袁啸说，“他提醒我，50年前爷爷就是在这片土地上筑路的。爷爷用石头铺路，我们用石头铭志，这种传承给了我坚持下去的力量。”

关于爷爷的记忆始终激励着袁啸。“小时候，爷爷告诉我，他驻扎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交通不便，没有蔬菜水果，常年吃罐头。由于身体长时间泡在水中，爷爷还患上了类风湿性关节炎，现在已经手脚变形，握不住筷子，也几乎走不了路。但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他反复对我讲的都是他的光荣和信仰。”袁啸说，现在每次放假回家，爷爷还是会和他念叨这些。

“当时爷爷不识字，但渴望知识，白天干完活晚上就趴在被窝里，握着一截比小拇指还短的铅笔，一笔一画地描着字，而我有知识有能力，更应该在高原上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

如今，袁啸已成为所里的“特殊人才”。他发挥专业优势，在巡边之余开展边境执法研究，撰写专业论文。虽然“师父”已调往他处，但每次夜巡经过“石头墙”，袁啸仍会用手电寻找那块写着“别害怕”的石头。“光束照到的那一刻，我的心里就特别踏实”。

每次从中巴友谊公路往返休假时，袁啸总会想起自己和爷爷在帕米尔高原上的经历。车轮碾过的每一公里，都延续着两代人守护边疆的承诺。在这片用石头见证忠诚的土地上，新的故事仍在继续。

石头见证两代人的忠诚

“我们边境线上的任何一块石头都不能被外人拿走。”这句肖恭尼家族世代相传的家训，也铭刻在排依克边境派出所民警们的心中。而在派出所的院墙上，另一种关于石头的传承正在延续——每位民警都会在巡逻途中挑选一块石头，刻下自己想说的话。

不同于其他民警在石头上镌刻“守土有责”“保卫家国”“无悔青春”，排依克边境派出所巡边队伍里戍边时间最短的民警袁啸，只在石头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而

浙江宁海“合议庭”巧解村级合同难题——

老院子“变形记”

本报记者 孙懿

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深甽镇南溪村，初夏的阳光穿过文化大院的廊檐，洒在村民王文彩的笑脸上。曾经对着杂草丛生的老院子叹气的王大妈，如今正热情地在自家小卖店前招呼着游客，旁边的咖啡屋飘来阵阵香气。这块村里过去的“卫生死角”，正以焕然一新的模样讲述着基层治理创新的故事。

南溪村的变化，始于一场“棘手的闲置”。村北面不到5亩的地块，是村民们的“心病”：破旧老宅摇摇欲坠，垃圾随处可见，蚊虫滋生不说，产权归属更是“一笔糊涂账”——既有村民私产，也有集体土地，想要开发却面临“拆不动、谈不拢”的困局。“以前想过拆翻建或者开发利用，光协调产权就碰了一鼻子灰。”村委会副主任张长水回忆，“村民担心利益受损，村干部怕担责任，这一拖就是20年。”

转机出现深甽镇推行“合议庭”制度之后。这个由纪检、农经、司法等多部门组成的“智囊团”，带着专业视角走进南溪村：“不大拆大建，能不能用‘共享庭院’的思路激活资源？”

一场场“现场议事会”在老院子里召开。法律顾问摊开产权图纸，农经干部算起经济账，纪检干部守住纪律红线……最终敲定资源盘活方案：村集体整合资产统一改造，打包出租宅基地，引入第三方运营团队。“没想到闲置了20年的破院子，还能变成‘香饽饽’。”村民张大爷望着大院的文化墙感慨。

40天，30万元，一场“微改造”让老院子脱胎换骨。杂草丛生的空地变成了铺着碎石小径的共享庭院，颓圮的老墙被改造成展示文化活动的艺术长廊，闲置民房摇身一变成咖啡屋和手作工坊。更让村民惊喜的是，“合议庭”牵线搭桥，将镇里的技能培训搬进了文化大院：香薰制作、宋代点茶、直播技能……村里的妇女组成“南溪嫂”创富团队，从“只会种地”到“能挣旅游钱”。“最开始老百姓

看热闹，现在争着学本事。”村妇联主席廖忠芳笑着说。

数据见证着变化：文化大院运营一年多以来，带动周边民宿、农家乐和温泉酒店，为村集体经济增收超70万元；美食集市、“歌王”大赛、亲子研学，各类文化活动一场接着一场；每到周末，村里停满了各地牌照的车辆，曾经的“杂乱荒”，变成了网红打卡地。

南溪村的蝶变，只是“合议庭”制度运转的一个缩影，其背后是宁海县深化学习教育撬动基层治理的实践创新。“合议庭”如同精密的齿轮，转动在资产处置的多个节点：在合同签订前，为村集体提供规范化指导，专业团队介入评估市场价格，避免“人情合同”和资产流失；在运营过程中，“三色预警”系统实时追踪租金收缴、业态合规性，让“糊涂账”变成“明白账”；在利益分配时，通过“五议决策法”保障村民知情权，将矛盾化解在萌芽……

“以前签合同靠‘拍脑袋’，现在有‘合议庭’，把法律关、市场关。”张长水翻开标准化合同范本，租金标准、履约保证金、违约责任等条款清晰明了。更让他安心的是，“合议庭”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让文化大院的年租金从最初预估的5万元跃升至15万元，“既防止了低价贱卖，又避免了干部担责，老百姓心里也敞亮”。

“合议庭”制度如同蒲公英的种子，在宁海乡村落地生根，激活了更多“沉睡资产”，为乡村集体经济增收保驾护航——据统计，全县已通过该制度起底经济合同3453份，涉及资金2.28亿元，通过规范合同条款、追缴拖欠款项，成功催收合同价款708万元，有效破除“权力包”“人情包”引发的作风乱象，以及村集体收入催收不力等问题。

从“闲置荒”到“文化热”，从“治理难”到“活力足”，宁海县用一个小制度撬动大变革，让老院子成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生动注脚。

前不久，笔者在乘坐高铁时遇到了这样一件事：一名两岁孩童一路兴奋地说个不停，音量正常，并未大声喧哗或哭闹，却被周围乘客要求保持安静。这让人不禁想起去年网传的一个视频：飞机上一名一岁女童因哭闹被陌生人拉到卫生间“教育”，直到停止哭泣才被带出。

这些经常出现在高铁、飞机上的小插曲，折射出当下公共空间权益分配的深层矛盾，也引发了人们对现代社会包容性与公共规则的广泛讨论。

公共空间的本质是多元需求的动态平衡，公共规则的制定和执行也应建立在合理性和包容性的基础之上。高铁作为公共交通工具，承载着不同群体的出行诉求：成年人大概更期待安静的氛围，儿童或许更喜欢玩耍，老人、病患等特殊群体则更关注是否便利。高铁上虽有“保持安静”的倡议，但如何把握“安静”的尺度还需商榷。

儿童正处于成长发育阶段，拥有独特的天性。尚在襁褓的婴儿尚不具备自我控制能力，长时间乘坐交通工具会有不适，哭闹难以避免；两岁的孩童正处于语言发展高峰期，对世界充满好奇，渴望通过说话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这是生命成长的自然过程，并非故意干扰公共秩序。要求婴儿或低龄孩童在出行途中全程保持安静，显然不合理，也是不现实的。

当然，强调公共空间对儿童的包容性，并不意味着纵容那些肆意踢踹座椅、追逐打闹的“熊孩子”

行为。现实中不排除有的家长过于宠溺，放任孩子在公共空间讨嫌。家长的责任边界同样需要明确。当孩子在车厢过道奔跑冲撞他人、用玩具敲击桌板制造噪音时，不应以“只是个孩子”作为“免责盾牌”，而要及时引导孩子，既尊重孩子天性，也要顾及周围乘客感受。

化解这一矛盾的关键，还在于推动服务与管理上的创新。近几年铁路部门设置的“静音车厢”“遛娃车厢”等都是有益尝试。期待未来能继续扩大现有“静音车厢”“遛娃车厢”覆盖范围，并明确普通车厢可接受的声音标准，避免“绝对安静”的苛求。

更值得期待的是公共服务的人性化升级：提供益智玩具、涂鸦画册等，帮助分散儿童注意力；通过公益广告、车厢广播等渠道传递“多代共融”理念，强调公共空间的非完美属性，呼吁公众理解儿童成长需求等。这些不仅能为旅客提供更舒适的旅行体验，也是打造儿童友好型社会的应有之义。

一个文明包容的社会，应当既能对故意喧哗者说“不”，也能对啼哭婴儿、慢行老人等弱势群体存有温情。公共空间的真正文明，在于学会在差异中共存。对旅途之中一些意外的、非主观故意制造的声响，不妨多一些宽容和体谅。

从高铁上的“小话痨”说起

社会 杂谈